

# 以文化创新解救“山寨”



■王石川

兵马俑何辜？一再被卷入是非。继陕西临潼山寨兵马俑景点被披露后，近日，某省另一文博园内出现的上千兵马俑又引争议。

相关仿制行为是否涉嫌侵权，自有法律最终认定，并非这里要讨论的话题。值得思考的是，在倡导创新精神、呼唤文化自信的今天，为什么一些山寨景观仍然时有出现？为何一些浅层次的模仿抄袭依然拥有市场？从天安门、故宫、天坛到埃菲尔铁塔、自由女神像、悉尼歌剧院……在国内一些旅游景区，或是克隆、照搬，或是缩微、高仿，往往不难找到复制件。诚然，不能因为“看到一个地球仪，就大喊山寨地球”，但某些低水平拷贝所折射出的创新缺失与偷懒心态，的确是个问题。

如果放在30年前，人们在北京的“世界之窗”看到代表各个文明的标志性建筑仿制品，在西南省会的某条街道看到巴黎的咖啡馆、纽约的牛排店，首先想到的是开了眼界、长了见识；然而今天，当成千上万的中国游客早已对这些耳熟能详，而我们的文化产业还停留在同样的层次，则不免令人叹息乃至丧气。无论是利益驱动下的“抱大腿”，还是暗中炒作中的傍名牌，拿来主义的方式看似节省了成本，却极易受到质疑。此前，河北某地按照1:1仿造埃及狮身人面像，就遭到埃及文物部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投诉，结果该狮身人面像被拆除。事实上，作品的灵韵就在于独特性。一旦涉嫌抄袭，就算再惟妙惟肖、大气磅礴，观者也难以感到惊艳；相反，如果初衷是创新，哪怕生涩一点、粗糙一些，也胜过千篇一律。说到底，抄袭者不仅缺少敬畏，也缺乏敢于创新、善于创新的智慧和勇气。

借鉴与模仿，致敬与抄袭，有时未必泾渭分明。但真正有抱负的创作者，往往是坚定的文化自信者，常以原创为己任。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笃信“只做自己认为美丽的事，创造出有震惊的效果的美感”，坚持用独特的方式诠释建筑、理解人生；普利

兹克建筑奖得主王澍被称赞“打开全新视野的同时，又引起了场景与回忆之间的共鸣”，背后正是持续而连贯的思考力。少一分走捷径的心态，多一分有脊骨的追求，自觉树立责任意识、精品意识，才能让自己的文化创新之路越走越宽广。

“未画以前，不立一格；既画以后，不留一格”。这是清代书画家郑板桥的创作箴言。当然，推陈出新，说易实难。尤其是当珠玉在前之时，后来者难免会感到难以超越，甚至心生胆怯。唐代书法家李邕说“似我者俗，学我者死”，齐白石则认为“学我者生，似我者死”。他们的创作观看似迥异，内在逻辑实则一致，即鼓励创新，而不能止步于模仿。正因如此，我们呼唤文化创新，更渴望孵化创新文化，加快培厚创新的文化土壤。

文化创造的进步，自然离不开文化管理部门和文化工作者这个共同体的引导，比如强化创新的价值取向，完善制度设计与奖罚机制，让创作者以创新为荣。而在某种程度上讲，文化消费者的态度和需求分量更重，随着他们的品位越来越高、口味越来越“刁”，那些低水平的仿冒者必将寸步难行。

## 建构新时代的乡贤文化

### 言者有意

乡贤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在乡村的一种表现形式。在我国传统社会，乡贤在促进宗族自治、民风淳化、伦理维系以及乡土认同等方面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。在宗族关系解体的现代社会，结合时代需要建构新乡贤文化，对于推动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。

传统乡贤基本上世居乡村，除了科举应试、入仕为官，一般都在乡村安身立命。离开乡土的官员，也常常告老还乡。而新乡贤大多数是离土离乡、已经城市化的人群，他们来到乡村，要么是回报故乡以实现更高的人生价值，要么是享受乡村独有的生活环境、颐养天年。从文化主体上说，新乡贤可以分为三类：从乡村走出去、现已退休的党政干部和教师中，不少人很有热情和担当，他们的经济基础较为稳固、社会关系较为广泛，成为现实或潜在的乡贤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及之后出生的人，有很多在改革开放中进入城市，其中一些人看到乡村发展的机会而回乡创业，他们是具有开创能力的乡贤；除此之外，为人正直公道、有公共服务精神的村民，以及其他具备一定资质的社会志愿者，也可以成为新乡贤群体的一部分。这三类是“在场”的新乡贤，还有一种是“不在场”的新乡贤，他们可能人不在当地，但通过各种方式关心和支持家乡发展，其思想观念、知识和财富都能影响家乡。

从完善乡村治理手段看，在一些乡村出现“空心化”等现象的情况下，搭建新乡贤与乡村社会结构有机融合的平台，能够促进公共服务普及与公序良俗形成，构建兼具乡土性与现代性的现代乡村治理模式。推动新农村建设的新乡贤组织，可称为乡村文明促进会。可以组建县、乡、村三级乡村文明促进会等社会组织，鼓励和支持新乡贤积极参与乡村公共建设和公益事业。其中，包括与县委、县政府合作成立有关专门委员会，如法治和民主协商、生态环境、公共文化服务、合作经营、生态农业和休闲旅游专委会等，协助研究和解决相关领域的问题。村级文明促进会可以设立民主协商、历史文化和道德教育等小组，邀请新乡贤参加村里的会议，对涉及村庄发展的重要决策发表意见。同时，可以让新乡贤对村两委的工作进行监督评判。新乡贤组织可以作为地方政府履行职能的依托与监督力量，促进地方政府职能转变。

建构新乡贤文化，有利于营造新乡贤参与家乡建设的氛围，提高村民参与乡村事务的积极性，增强基层群众的向心力和自治能力。应鼓励新乡贤挖掘和宣传传统乡贤的思想、精神及其先进事迹，传承乡土历史文化。积极邀请新乡贤主持道德讲堂，敦厚民俗民风。新乡贤还可以通过乡村文明促进会这个平台，化解乡村社会矛盾、稳定乡村社会关系，促进农民、农村顺利融入现代化进程，分享改革开放红利。应积极引导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，聘请他们担任决策智囊团成员，充分发挥其出谋划策的决策咨询功能。同时，“在场”的新乡贤应以乡情为纽带，积极联络“不在场”的新乡贤，通过节日慰问、拜访联谊等形式，争取外出新乡贤对家乡的支持和反哺，努力实现资金回流、企业回迁、信息回传、人才回乡。

(摘自《人民日报》)



### 到农村去

越来越多以高学历、高技术为特征的创业者进入三农领域深耕，他们既脚踏实地“关心粮食和蔬菜”，又“面朝大海”眺望市场和未来。这种“新农人”现象意味着，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，三农领域必将成为各路有头脑、有远见、有闯劲的有志之士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。

新华社发

### 假如花炮更环保



元宵之夜北京城里，此起彼伏的花炮声让现代都市平添传统节日的热闹喜庆，但燃放烟花爆竹带来的呛人烟尘，也引来不少抱怨。

燃放烟花爆竹，成为节日都市空气污染和噪音污染的主要来源，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，于是多年前一些城市就纷纷出台禁放措施。北京等大都市的环境容量本来就很有限，人们的环保意识强，天蓝水净更

加稀缺，因此禁放措施愈加严密。这个元宵节晚上，一些禁放区域还特别安排人员严密监视，严防死守。遗憾的是，空气是流动的，燃放区域的巨大噪音和弥漫的硝烟，穿透人为划定的区域而弥漫在整个城市上空。北京及周边不少城市的空气质量指数，很快从个位数迅速蹿升至三四百的重污染级别。于是有人在微信上反思。

禁放已经十几年了，节庆之时还有人爱放烟花，说明放烟花的传统仍有很强的需求，不是单靠政府指令或者旁观者的抱怨能解决的。其实，燃放所带来的污染只是副产品，而这种“副产品”，或许可以通过研攻关来逐步消除。

比如同样是我们老祖宗发明的造纸。多少年来，造纸小作坊里一直污水横流，但随着国家出台各种措施严厉打击、关停并转，建立在技术进步基础上的造纸产业不断升级换代，造纸逐渐从污染大户的阴影中走了出来。

烟花爆竹是一种传统文化情结，也是一种产业。可喜的是，目前一些地方和企业正在研制的环保烟花、无烟烟花等新产品正不断占领市场。因此，我们不妨揣想：通过不断的科研攻关，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烟花爆竹也能走出污染的阴霾，让洁净、喜庆的光彩装扮城乡节日的夜空。

(摘自《人民日报》)